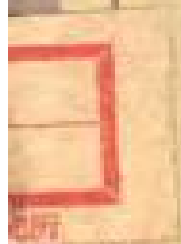




哥达綱領批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哥 达 綱 領 批 判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 寧 斯 大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12694

一九六五年 七月 廿四日

KARL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本书中“马克思致白拉克”、“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和“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三篇的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其余各篇是按“哥达纲领批判”柏林狄茨出版社1955年版译出的。

馬 克 思
哥 达 綱 領 批 判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 $\frac{1}{2}$ · 插頁 5 · 字數 53,000

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657 定價（西）0.59元

目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	3
馬克思致白拉克 (1875年5月5日)	5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7
一	7
二	18
三	20
四	21

恩格斯論“哥达綱領”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75年3月18—28日)	31
恩格斯致白拉克 (1875年10月11日)	39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75年10月12日)	42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1月7日)	45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1月15日)	47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2月5日)	48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2月11日)	50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1年2月11日)	53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2月23日)	54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1年3月4日)	58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91年5月1—2日)	59

附录

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綱領 (1869 年在爱森纳赫通过).....	64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綱領 (1875 年在哥达通过)	66
注释	68

卡·馬克思
——
哥达綱領批判¹

卡·馬克思写于 1875 年 4 月—5 月初
載于 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3 年柏林狄茨 出版
社德文版第 2 卷譯出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給白拉克的附信和对綱領草案的批判，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²召开以前不久送給白拉克，請他轉給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馬克思。既然哈勒党代表大会³已把关于哥达綱領的討論提到了党的議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討論的重要的——大概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隱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显而坚定地表明了馬克思对拉薩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針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薩尔的經济学原則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綱領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銳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結論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見怪了。特殊的拉薩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殘余存在着，而哥达綱領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創造者們在哈勒当作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內容沒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銳的詞句和評語刪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綱領草案中所表現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特別强烈地激怒了

我們。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⁴閉幕后刚刚过去两年，我們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們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要我們負責；因此我們也不得不預期到，他們会誣指我們是这个綱領的秘密創作者。这些顾虑現在已經消失，因而保留一切有关的地方也就沒有必要了。

由于出版法的緣故，有些語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較緩和的說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馬克思致白拉克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綱領的下列批評意見，請您閱后轉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經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給我規定的工作時間。因此，写这么多张紙，对我來說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內的朋友們——而这些意見就是为他們写的——以后不致誤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驟，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簡短的声明，声明的內容是：我們和上述原則性綱領毫不相干，我們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見解——一种完全荒謬的見解，仿佛我們在这里秘密地領導所謂爱森納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⁵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綱領等等負責，甚至要为李卜克內西自从和人民党⁶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驟負責。

撇开这一点不談，我的义务也不容許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綱領。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綱領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許这样做——超过爱森納赫綱領，那就干脆締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則性綱領（應該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較長時間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

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攏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組織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此外,即使这个纲领没有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已经收到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⁷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⁸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⁹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員。”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綱領不应当容許这种资产阶级的說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說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談。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 and 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創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們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

那么結論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財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曖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話，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結論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話，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說，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們現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說，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損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門，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閑，如此等等，——一句話，可以抄襲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預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結論：“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員。”

多妙的結論！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維持劳动“条件”即維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論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滿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維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滿足各种私有財

产^①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終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②。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头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译者注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译者注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話，經過这番“修訂”就变成荒謬的了。

在現代社会中，劳动資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資本垄断的基础）。无論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沒有提到。它談到的是“劳动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語充分表明，劳动資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訂，是因为拉薩尔由于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資本家阶级，而沒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資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資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財產，要求集体調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資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財產”（！），应当是說把它們“变为社会的公共財產”。这不过是順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費掉的生产資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薩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經濟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資產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現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难道經濟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調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嗎？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嗎？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語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們必須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設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資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調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們則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員”。

“属于社会一切成員”？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員嗎？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員嗎？那么社会一切成員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薩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們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語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現在从它里面應該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費掉的生产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險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現有的資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論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則無論如何是不能計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費資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沒有关系^①的一般管理費用。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是，**沒有直接关系**。——譯者注

和現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縮減,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設施等。

和現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現在属于所謂官办济貧事业的部分。

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尔的影响下偏狹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間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經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間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員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謀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語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語現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資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換自己的产品;耗費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們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資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語,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們这里所說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經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帶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

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給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時間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費資料。他以一种形式給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領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調节商品交換(就它是等价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間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換。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則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价物的交換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場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較长的時間;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時間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來說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別,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

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①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①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变成陈詞濫調的見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們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慣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党而現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則表現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則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費資料的現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賴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車呢？

4.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对它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經過了“修訂”。那里写道：“工人階級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說“工人階級”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誰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¹⁰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障地的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¹¹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¹²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¹³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¹⁴！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

的，而决不滿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國內從事貿易的意識。

各國工人階級的国际活動絕對不依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為这种活動創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嘗試；这种嘗試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動力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績，但是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后，已經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繼續下去了。

俾斯麥的“北德報”為了取悅于自己的主人，宣稱德國工人黨在新綱領中放棄了国际主義，它的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¹⁵。

二

“德國工人黨從這些原則出發，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來爭取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廢除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和——任何形式的剝削，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關於“自由”國家，我以後再講。

這樣，德國工人黨將來就不得不相信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¹⁶了！為了不讓它埋沒掉，竟胡說什麼“廢除工資制度（應當說：僱傭勞動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如果我廢除了僱傭勞動，那末我當然也廢除了它的規律，不管這些規律是“鐵的”還是海綿的。但是拉薩爾反對僱傭勞動的鬥爭幾乎只是繞着這個所謂規律兜圈子。所以，為了證明拉薩爾派已經獲得勝利，“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都應當被廢除掉，而不是不連同後者。

大家知道，在“鐵的工資規律”中，除了從歌德的“永恆的、鐵的、偉大的規律”^①中抄來的“鐵的”這個詞以外，沒有一樣東西是

① 引自歌德的詩“神妙的”。——譯者注

拉薩尔的。“铁的”这个詞是虔誠的信徒們借以互相識別的一个標記。但是，如果我接受帶有拉薩尔印記因而是拉薩尔意义下的規律，那末我就不得不連同他的論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論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薩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揚的）馬尔薩斯的人口論¹⁷。但是，如果这个理論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規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規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經濟学家們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薩尔对这个規律的錯誤了解不談，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薩尔死后，在我們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見解已經給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資的全部資產階級見解以及对这种見解的全部批評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資本家（因而也为他們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个資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問題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殘酷，不管工人得到的報酬較好或是較坏。而現在，当这个見解已經在我們党内愈来愈給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薩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們应当知道，拉薩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資，而是跟着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把外表当做事

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們最終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縛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綱領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須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給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們党的代表們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見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們在草拟妥协的綱領时輕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責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語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問題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無論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們里面产生出調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組織。”

在拉薩尔的“铁的工資規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錯。現存的阶级斗争被換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話：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問題”。“調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組織”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轉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給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薩尔的幻想：靠国家貸款能够建設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設一条

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說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識到自己既沒有当权，也沒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詳細批評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場”¹⁸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綱領，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場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場。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爭取变革現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現存的合作社，那末它們之所以可貴，仅仅是因为它們是工人自己独立創設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四

現在我們来談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說法，德国工人党力求爭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經摆脱了狹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俄国一样地

“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

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綱領既沒談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沒談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廢話，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这純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實現了。不过實現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們忘記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說，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則，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沒有意义了，因为人們只要求他們所沒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應該忘記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謂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們沒有勇气^②——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謹慎——像法国工人綱領在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拿破侖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誠实”¹⁹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杂着封建殘余、已經受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沒有，陈旧的。——譯者注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 年版是：既然他們不能。”——譯者注

到資產階級影响、按官僚制度組織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軍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們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爭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階級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連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許而为邏輯所不容許的范围內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們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話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經濟基础:实行統一的累进所得稅……”。賦稅是政府机器的經濟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經实现了。所得稅是以不同社会階級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說,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財政改革派——以格萊斯頓的弟弟为首的資產者們——提出和这个綱領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費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 他們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是不是以为在現代社会里(而所談到的只能是現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階級都可能是**平等的**呢? 或者是要求上层階級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經濟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經濟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 项第 5 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费用、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²⁰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

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 “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 “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一样。”——译者注

員只有經過法庭才能撤換；每個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發視察員的失職行為；視察員必須是醫生出身。

5. “調整監獄勞動。”

在一個一般的工人綱領里面，這是一種微不足道的要求。無論如何應該明白說出，工人們完全不願意由於擔心競爭而讓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樣的待遇，特別是不願意使他們失掉改過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產勞動。這是應當期望於社會主義者的最低限度的東西。

6. “有效的責任法。”

應該說明，“有效的”責任法是指什麼東西。

順便指出，在關於正常勞動日的一條中，忽略了工廠立法中關於衛生設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當這些規定遭到破壞時，責任法才發生效力。

總之，這一部分也是寫得很草率的。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恩 格 斯
論“哥 达 綱 領”

恩格斯致倍倍尔²¹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²²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

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們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薩尔派，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許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綱領草案证明，我們的人在理論方面比拉薩尔派的領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誠实的人”^① 又一次受到了不誠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騙。

第一，接受了拉薩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錯誤的說法：对工人階級說来，其他一切階級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場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經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來說，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們，同人民党携手合作了这許多年呢？“人民国家报”²³ 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²⁴ 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內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綱領中列入了整整七項簡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綱領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項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項要求中沒有一項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²⁵。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則在目前实际上已經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則的人們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們在战争期間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沒有能做得这样好。現在，在国外，当各国政

① 人們把爱森納赫派称为“誠实的人”。——譯者注

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²⁶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 1869 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話），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 1870 年至 1871 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資規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規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論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論据）。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已经詳細地证明，調节工資的各种規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規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規律占优势，所以它們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語来了結。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襲来的这一規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論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讀本”第 5 頁²⁷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論

据,已被馬克思在“資本的积累过程”²⁸一篇中駁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薩尔的“铁的規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錯誤的論点和它的一个錯誤的論据。

第四,綱領把拉薩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²⁹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們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薩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們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賤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們的陣地!

拉薩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許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綱領草案却用軟弱无力的詞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問題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們还有一个在理論上**沒有解决的社会問題**似的!所以,如果說:“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項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沒有一个拉薩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駁来的。

第五,根本就沒有談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組織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組織,它靠这种組織和資本进行經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訓練,就是最殘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現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組織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們认为,在綱領里提到这种組織,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組織中給它一个位置,那是絕對必要的。

这就是我們的人为了討好拉薩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

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綱領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純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純粹的时髦貨，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話，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沒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員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負責。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資产階級綱領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說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廢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馬克思駁斥蒲魯东的著作³⁰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暫时的机关，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談了；当无产階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国家**”一詞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階級差別”，这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

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經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現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經有了闡述这一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連文字也写得干癟无力的綱領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綱領,如果它被通过,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們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們將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請您想想,在国外人們是要我們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負責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們替“民主周报”創辦以来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話負責³¹。在人們的想像中,我們是在这里指揮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几乎从来沒有对党的內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說干涉过的話,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們看来是錯誤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限于理論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綱領形成一个轉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們拒絕替承认这个綱領的政党承担任何責任。

一般說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綱領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綱領無論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納赫綱領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綱領将会說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階級向拉薩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連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們党的优秀分子会願意不断地重复拉薩尔关于铁的工資規律和

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詞句嗎？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們这样做，他們的听众就会向他們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薩尔派会死抱住綱領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們已經恢复哈賽尔曼、哈森克莱維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誠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們将被削弱，而拉薩尔派将会增强；我們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純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薩尔詞句；如果拉薩尔派以后又說：他們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們的人是資产者，那末，他們是可以拿这个綱領来证明的。綱領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們的，而我們的党除了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沒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綱領中又把小資产階級民主派說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攔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不願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綱領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們的意見。因此，为了迅速起見我把这封信寄給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朗姆，我給李卜克內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諒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說太迟的时候他还連**一个字**也沒有告訴我們（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經詳細地通知我們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們，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許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們**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場。——譯者注

希望您設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們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獄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 弗·恩·

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恩格斯致白拉克

1875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我拖到现在才答复您最近的几封来信（最后一封是6月28日），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和我已有六个星期没有会面——他在卡尔斯巴德，而我在海边，在那儿我看不到“人民国家报”——，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稍等一个时候，看看新的合并和联合委员会³²在实践中表现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李卜克内西因为急于达到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整个事情弄糟了。可以认为合并是必要的，但是不必向缔约的对方说出来或表示出来。否则，以后就得永远拿一个错误为另一个错误辩护。当合并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得到实现并且受到称赞之后，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让它失败，这样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重新作出让步。您说的完全对：这次合并本身就包含着分裂的萌芽，如果以后背叛的只是那些不可救药的狂热分子，而不是也包括那一整批本来很干练的、在良好的教导之下可以发挥作用的追随者，那我将会感到高兴。这要取决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条件。

这个经过最后修改的纲领包括下面三个组成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如果两个派别实行合并，那末写入纲领中的应该是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是有争论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人竟容许了这些，自愿地

接受了奇耻大辱；

2. 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格式拟出的；

3. 一些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命题，多半是从“宣言”中抄来的，不过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加以观察，全部都包含着令人毛骨耸然的胡说。如果不懂得这些事物，那就不要触动它们，或者把它们从懂得这些事物的人那里逐字逐句地抄下来。

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读到了其中本来应该包含但是现在并没有包含的东西，哪一方面都没有人想到按照纲领的真实内容来考察这些奇怪条款的任何一条。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同时，这些条款不能译成任何一种外国文字，除非硬写成明显地疯狂的东西，或者给它们加上共产主义的含义，而后者是朋友和敌人都会做的。我自己在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翻译纲领时就不得不这样做。

我从委员会的活动中所看到的，还不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攻击您的和伯·贝克尔的著作的事件³³；如果它没有实现，那不是委员会的过失。第二，宗纳曼（马克思在旅途中曾遇到他）说，他曾建议瓦尔特希为“法兰克福报”撰稿，但是委员会禁止瓦尔特希接受这个建议！这比书报检查制度还更进一步，我不了解，瓦尔特希怎么能容忍这种禁令。这是何等愚蠢！他们以前就应该考虑到，使“法兰克福报”在德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人为它服务！最后，拉萨尔派的成员在建立柏林联合印刷所的行为，在我看来，也不是很有诚意的；当我们的人在莱比锡印刷所轻信地委任该委员会为监察委员会之后，我们的人还会被强迫在柏林也这样做。不过，我在这里对详情不十分了解。

委员会很少开展活动，而且正像这几天曾在这里的卡·希尔施所说的，它只是作为通讯机关和问讯机关混日子，这是好的。委员会的任何积极的干与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看来人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同意在委员会中有三个拉萨尔分子，而只有两个我们的人，这是何等软弱！

总的说来，我们似乎只受了一点损失，虽然损失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希望，事情不再发展下去，而在这期间，宣传工作会在拉萨尔派中间起到自己的作用。如果事情拖延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³⁴的时候，那就好了。不过，施梯伯^①和特森多尔夫^②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而且会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人们将看到哈赛尔曼和哈森克累韦尔担任什么工作。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换了一个人的样子，强壮、活泼、愉快、健康，又可以着手切实地工作了。他和我衷心地问候您。如有机会，请您再告诉我们那件事情的进行情况。莱比锡人³⁵对那件事情过于关切，以致他们不向我们说明真相，而党的内部事情正是现在才不宜公布出来。

您的最忠实的 弗·恩·

① 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译者注

② 普鲁士国家检察官。——译者注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75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的这个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在纲领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当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并非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看来，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不可缺少的和唯一的良药。让“铁的工資規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的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的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否认掉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奇耻大辱，我们党就带着这样的耻辱匍匐于神圣的拉萨尔的赫赫声名之前；

2. 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格式拟出的；

3. 向“现代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谁也不知道，其余的“要求”

应当向誰提!), 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邏輯的;

4. 一般的原理, 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國際的章程中抄来的, 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內容**全部弄錯**, 就是变成了純粹的廢話, 正如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①中所詳細指出的那樣。

整个綱領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邏輯和有失体面的。要是資產階級新聞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 他就会把这个綱領拿去逐句研究, 弄清每句話的真实含义, 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誕无稽的地方, 揭露出矛盾和經濟学上的錯誤(例如, 劳动資料今天为“資本家階級所壟斷”, 似乎地主已經不存在了; 不說工人階級的解放, 而說“劳动的解放”, 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分自由了!**), 并且把我們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資產階級新聞界的蠢驴們沒有这样做, 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綱領, 加进了其中所沒有的东西, 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們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 馬克思和我才沒有公开否认这个綱領。当我們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們的見解掺到这个綱領中去的时候, 我們可以对这个綱領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問題上所达到的結果感到滿意, 那就是說, 我們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們的人, 三个是拉薩尔派! 因此, 在这里, 我們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 而是战敗者, 并且事先就决定了我們的少数派地位。委员会的活动, 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 也不是令人快慰的: 1. 決議**沒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貝克尔的关于拉薩尔主义的两本著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能把这个決議撤銷, 那就既不是委员会的也不是李卜克內西的过失; 2. 禁止瓦尔特希接受宗納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

① 指“哥达綱領批判”。——譯者注

兰克福报”記者的建議。这是宗納曼亲自告訴正在旅行中的馬克思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說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尔特希不是对委员会滿不在乎而是对它唯命是从，不如說是这项決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應該設法使得像“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們的人去替它服务……

說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試驗，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結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維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弗·恩·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昨天我挂号给你寄去了马克思的手稿^①，这会使你感到满意。我怀疑，在神圣的德意志帝国，这篇手稿能够照原样发表出来。请你从这个角度考虑，只要行得通，就把可疑的地方删掉，用省略号来代替。但是，上下文的联系不允许这样做的地方，就请你在校样上标出来，可能的话，用三言两语写明可疑的理由，那时，我将做我可能做的事情。我将把这些变动的地方加上括弧，并在我的序言中说明，这些是修改过的地方。因此，请把校样寄来。

但是，除了一个高级的警察，也许还有其他人不喜欢发表这个文件。如果你认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那就请你把这份手稿挂号寄给阿德勒^②。在维也纳那里，大概可以全部刊印出来（可惜，关于宗教需要的精彩部分除外），而且无论如何是会被刊印出来的。但是，我认为，我在这封信中告诉你的十分肯定的意图，会使你完全避免任何可能的非难。既然你们反正不可能阻止手稿的发表，那末，在德国国内，在专门为了这类东西而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³⁶上发表这个手稿，岂不好得多。

为了给你准备好这件东西，我已经中断了关于布伦坦诺的写

① 指“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② 维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译者注

作³⁷；因为我在这个著作中需要利用論述铁的工資規律的地方，而且，不馬上把这件东西付印，那就不值得花力量去做了。我本想在这个星期內弄完布伦坦諾，但是在这期間又有这么多事情打扰，要写这么多的信，看来这个著作几乎不可能完成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請通知我……

你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从随信寄去的校样中就可以看出，我不是不近人情的，甚至还在序言中加了一点使人镇静吗啡和溴化钾，这或许能够对我的朋友狄茨的痛苦心情产生相当的止痛作用。今天我还要给倍倍尔写信。关于这件事情，我早些时候什么也没有告诉过他，因为我不愿意使他对李卜克内西采取错误的态度。那样，他就不得不同李卜克内西交涉这件事，而后者——正如他在哈勒作的党纲报告³⁸所证明的，他从手稿中作了摘录——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手稿的发表。

如果“……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这句话不便保留的话，那就把加了着重号的几个字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这种暗示是比较恰当的，而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做，大概不会引起什么顾虑。

另外，为了使你和狄茨满意，我作了你们要求的一切，甚至——正如你看到的——**更多些……**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以为，关于馬克思文章的信件把我們这里都轰动了，——完全相反，我們什么也沒有听到，也沒有看到。

星期六“新时代”沒有到，当时我就想或許又出什么事了。星期日，爱德^①来了，并把你的信給我看了。当时我想，压制手段还是得逞了。星期一终于来了一期，过了一些时候，我发现“前进报”³⁹也轉載了。

既然根据反社会党人法采取的措施失败了，那末这些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勇敢的步骤。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好的方面，他为了消除奥古斯特^②在最初的恐惧中談到的那个很难逾越的鴻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无论如何，这种恐惧主要是由这样的担心产生的：敌人乘这个机会将作些什么？由于这件东西在正式机关报上轉載，就打击了敌人的投机，并且能够使我們說：看，我們是怎样进行自我批評的——我們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来，模仿模仿我們吧！而这也是这些人一开始就应当采取的正确观点。

因此采取反对你的手段也是很难实行的。我請求在必要时把这件东西寄給阿德勒，一方面这可以影响狄茨，另一方面可以使你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譯者注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譯者注

摆脱责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使你陷入了为难的境地。我也曾写信给奥古斯特，我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如果还有什么人负有责任的话，那就是狄茨。他知道，在这类事情上，我对他总是迁就的。我不仅缓和了他所希望缓和的全部地方，而且还缓和了别的一些地方。如果他划出更多的地方，那也会给予考虑的。但是，狄茨不讨厌的地方，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把它放过去呢？

另外，在最初的恐惧之后，除了李卜克内西，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谢我发表这件东西。它可以使下一个纲领摆脱任何不彻底性和空洞的言词，并且提供了不可反驳的论据，他们^①中间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勇气主动地提出这些论据。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没有修改这个不好的纲领，因为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而现在，他们自己却放弃了这个纲领。在十五年前实行合并的时候，他们做了蠢事，并且受了哈赛尔曼等人的欺骗，现在，对于这一点，他们确实会坦率承认的。无论如何，纲领中的三个组成部分：（1）专门的拉萨尔主义，（2）人民党的庸俗民主主义，（3）胡言乱语，并没有因为它们作为党的正式纲领在醋里泡了十五年之久而变得好些，如果今天还不该公开谈出这点，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你听到什么新消息，请告诉我们。

由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① 指爱森纳赫派。——译者注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多謝你的两封来信。倍倍尔和席·^①的信随信退还。

柏林人对我的抵制还没有消除，我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他们肯定还没有作出决定。但是，在“汉堡回声报”⁴⁰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如果考虑到这些人还受到拉萨尔主义的强烈影响，甚至誓信既得权利体系⁴¹，那末，这篇社论还是很合乎情理的。从这篇文章和“法兰克福报”也可以看出：敌对报刊的攻击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如果不是全力以赴的话。只要抗住这种攻击，——据我看，直到现在这种攻击是很软弱的——，人们就能从最初的恐惧中恢复正常。但是，阿德勒的驻柏林记者（阿道夫·布劳恩？）却因为我发表马克思的文章正式地向我表示感谢。再有两三个这样的表示，反抗就会减弱。

在1875年5—6月间，他们故意对倍倍尔隐瞒这篇文章，并且加以扣留。当倍倍尔告诉我：他的释放日期是4月1日的时候，我马上就弄清了上述情况。我也写信告诉他：这篇文章**务必要看**，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对这个问题，我要求他在必要时给我以答复。这个文件长期压在李卜克内西手里，白拉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那里要了回来。李卜克内西想把这个文件完全保留

^① 麦克斯·席佩尔。——译者注

在自己手里，以便在最后修改綱領时加以利用。如何利用，这是众所周知的。

請把拉法格的文章用挂号的稿件包裹寄給我，我准备把它整理一下。另外，他的关于帕德列夫斯基的文章非常好，对于駁斥“前进报”对法国政治的歪曲是很有用的。威廉^①在这方面运气不佳。他到处盛贊法兰西共和国，而他的特約記者盖得却到处找它的毛病。

我对由席·宣布的党团⁴²声明是毫不理会的。如果他們願意，我准备向他們证明：我沒有向他們請求批准的习惯。不管他們认为发表馬克思的文章是对还是不对，对我來說都是一样。我願意讓他們保留就这个問題或那个問題发表不同意見的权利。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由于我絕對被迫地行动而造成的，我根本不考慮对这一点作出答复。我們就等着看吧。

我不会就这件事情給倍倍尔写信，因为，第一，他本人應該先向我表明，他对这件事的最終意見是怎樣的；第二，党团的每一次决定都是由所有的人签名的，不管他們同意还是不同意。另外，倍倍尔想錯了，他以为我自己使自己陷入了令人痛心的論战。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一开始就会对我撒謊等等，而对这些謊言我是不会置之不理的。相反地，我确实感染了和解的情緒；我甚至沒有什么理由生气，而是渴望架設任何一种桥梁——浮桥，杙架桥，铁桥或石桥，甚至金桥，以便通过倍倍尔在很久以前就預料到的各种深渊或鴻沟。

奇怪！現在席·写到許多以自己的拉薩尔主义感到自豪的老拉薩尔分子，而他們在这里的时候，他們异口同声地說：在德国再

^① 威廉·李卜克內西。——譯者注

沒有拉薩尔分子了！这正是使我打消許多怀疑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現在倍倍尔也出面了，并且认为，許多优秀的同志被严重地侮辱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們也应该向我如实地介紹情况。

其次，如果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还不应该直率地談出拉薩尔在理論上的蠢事和他自命为預言家的野心，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党本身、执行委员会、党团以及其他等等，由于反社会党人法而免受一切譴責，但是，对它們通过这样的綱領的譴責除外（而这是不应迴避的）。当这个法令还生效的时候，对綱領的任何修改都是談不上的。而法令一废除，它們馬上就把修改提到日程上来了。那还要做什么呢？

最后，人們不再小心謹慎地对待党內的官吏——自己的僕人，对待他們不再像对待不可能犯錯誤的官僚那样只是百依百順而不敢批評了，这也是必要的。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月16日的来信收到了……

在“新时代”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想你已经读过了。在德国，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激起了社会主义当权者的巨大愤怒，但是，这种愤怒看来已经有些平静下来。相反地，这篇文章在党内——老拉萨尔派除外——却很受欢迎。维也纳“工人报”⁴³（你将在下一邮班收到）驻柏林记者正式感谢我为党作出的这一贡献（据我猜测，他是阿道夫·布劳恩，维克多·阿德勒的妹夫，李卜克内西的“前进报”的助理编辑）。李卜克内西当然要大发雷霆，因为整个批判是专门针对他的，而且正是他同好男色的哈赛尔曼一起制造了这个腐朽的纲领。当这些人现在受到不拘礼节的对待，他们的纲领被斥为纯粹的胡说的时候，我理解他们的最初的恐惧，他们至今还坚持只能受到“同志们”的极端温和的对待。卡尔·考茨基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很勇敢，正像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党团企图发表一项声明，说发表这篇文章没有通知他们，他们反对发表。他们可以随便使自己得到快慰。但是，他们大概不会得到什么结果，如果党内赞成的人日益增多，并且认为，关于“这会给敌人提供反对我们自身的武器”的叫嚷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这个期间，我受到了这些先生们的抵制，这对我是完全合适的，因为这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无论如何，这不会继续很久了……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谈马克思的信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那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大体上说来，给敌人造成的印象是对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的异常惊愕和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自己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呵！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情况。老实说，这也是我发表这个文件的意图。这个文件在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这是我知道的，然而这是无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情况。我也知道，党已经非常巩固，足以经受这种事情，而且我认为，党在目前也经受得起这种在十五年前使用过的直率的语言，以后将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样的力量的测验，并且会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做这样的事情呢？可是这句话已经让给萨克森和维也纳的两个“工人报”以及“苏黎世邮报”⁴⁴去说了。

你在“新时代”第21期上担负起发表的责任，你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还是我给予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强迫你做的。所以我自己仍然要负主要的责任。至于说到细节，那末在这方面始终是可以具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

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經刪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划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像我一向向你們证明过的那样尽可能地迁就。但是，至于說到主要之点，那末**我的責任**就是：綱領刚一提出討論，就公布这个文件。况且李卜克內西在他在哈勒作的报告里面已經肆无忌憚地部分地把这个文件的摘录当作他自己的东西来利用，而部分地又不指名地对这个文件进行反駁，現在，在这个报告之后，如果馬克思还在世的話，他一定会拿自己的原稿来对这种改作表示异議，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很久以后寻覓了很長時間才找到的。

你說，倍倍尔写信告訴你，馬克思对拉薩尔的評論引起了老拉薩尔派的恼怒。这是很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經過，在这方面倒是值得启发他們一下的。如果这些人不知道拉薩尔的全部伟大是由于多年来馬克思容忍他利用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裝飾門面，而且因为經济学修养不够还歪曲了这些成果，那末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遺囑执行人，所以我也有我的責任。

拉薩尔已有二十六年是属于历史的了。如果在特別法时期沒有对他进行过历史的批判，那末現在終于已經到了理应出現历史的批判并弄清拉薩尔在对馬克思的关系上所处的真正地位的时候了。掩飾拉薩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神話絕不能成为党的信条。尽管把拉薩尔对运动的功績評價得很高，但是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是两重性的。亦步亦趋地跟在社会主义者拉薩尔之后的是蠱惑家拉薩尔。透过鼓动者和組織者的拉薩尔，到处显现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費尔特訴訟案⁴⁵的律师的面貌；在选择手段上同样地恬不知耻，同样地傾心于把名声很坏和卖身求荣的人們拉在自己周围，可以把他們当作單純的工具使用，然后再抛弃掉

他們。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魯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刚看过他写给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純私人的原因，他突然轉變了并开始了他的宣传活动。还不到两年，他就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資產階級，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这样勾結在一起，以致如果他不是僥幸及时被打死的話，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他的宣传文章里，从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正确的东西和拉薩尔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錯誤的議論紧密地交織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感到自己被馬克思的判決所侮辱了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薩尔两年的宣传活动中知道拉薩尔，而且还是通过有色眼鏡看到这一点的。但是在这种偏見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恭敬的姿态的。我的責任就是最終地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馬克思和拉薩尔之間的关系。这已經做到了。我暫時可以因此而感到滿足。何况我現在还要做別的事情。而已經公布的馬克思对拉薩尔的无情的判決，自然会发生应有的效果并給別人一种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发表意見不可，那末我就沒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拉薩尔的神話了。

在議會党团里有人要求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議會党团独裁（这个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出現了呢，还是对馮·施韦泽过去的严格的組織的回忆呢？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掉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来制造和实行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会照料到不叫树木长得戳破了天。

“前进报”上的那篇文章⁴⁶很少能打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的对事情經過的叙述，然后用尽可能友好的語調对这二者作答

复。“前进报”上那篇文章只需纠正几个不正确的地方（例如好像是我們不願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馬克思的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如果没有新的攻击或不正确的論断迫使我繼續下去，我想，在我这方面就以这个答复来結束現在的爭論。

請告訴狄茨，我正在忙于修訂“起源”⁴⁷。可是今天又收到費舍的信，他也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1年3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2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在这期间，关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于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的纲领信深为不满一事，你大概已经听到很多了。这件事还没有平息。我暂且叫这些人出出丑，在这方面，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表现得特别严重。当然，我在这方面会给予答复，但是，不经过无谓的争吵，不经过轻微的讽刺，事情几乎是不能了结的。所有在理论方面有资格的人，自然都站在我这一边——我必须只把倍倍尔除外，因为他实际上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地感到受了我的伤害——，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四个星期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看“人民报”⁴⁸了，所以我不了解这件事在美国是否有什么反映。在欧洲，拉萨尔派的残余又在发狂。对这些人，你们已经够厌烦的了……

你的 弗·恩·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今天回答你3月30日和4月25日的来信。我欣慰地得悉，你们的银婚过得十分美满，并且引起了你们对未来金婚的愿望。我衷心地祝你们二位如愿以偿。在我——用老德骚人的话来讲——被魔鬼弄走之后，我们还需要你很久很久。

我必须再一次——希望是最后一次——回过来谈谈马克思对纲领的批判。“对发表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反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从来就不愿意发表，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从1875年起，他一直不能忍受这个批判，以致一提及“纲领”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勒的全部发言都是围绕着他讲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夸张的文章，只不过是批判本身居心不良的表现。的确，这一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根据纲领的腐朽的方面，我们过去认为，而且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合并纲领之父。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如果我能够和你一人讨论文件，然后立即把它寄给卡·考茨基发表，我们两小时就能谈妥。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关系和党的关系来说，你都必须邀请李卜克内西商谈。我知道这会引出什么结果。或者把文件压下来，或者，如果我终究采取了行动，那末就得公开争吵，至少得争吵一个时候，甚至和你也要争吵。我没有说错，下述一点可为我作证：你是4月1日出狱的，而文件上所注的日期是5月5日，所以，如

果沒有其他的解釋，那就很明顯，那件東西是**被故意隱藏起來**不給你看的，而且這**只能是李卜克內西**干的。但是，你為了和陸相處竟允許他製造謠言，說你因為坐牢而沒有看到那件東西。這樣，為了避免在執行委員會發生爭吵，在付印問題上你又得考慮李卜克內西的意見。我認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考慮到事情很可能這樣發生，希望你也能夠認為是可以理解的。

剛剛我又把那件東西讀了一遍。也許再刪去一些也無礙大體。但可刪的肯定不多。當時情況怎樣呢？隨著草案被它的全權代表通過，**事情已經決定了**，對這一點，我們知道得不比你們差，也不比如我找到的1875年3月9日“法蘭克福報”差。因此，馬克思寫了那件東西，只是為了拯救良心，絲毫不指望有什麼成果，結尾的話可作證明：*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①。因此，李卜克內西就絕對的“不”字大肆吹噓只不過是純粹的傲慢，而且他本人也知道這一點。如果說你們在選舉你們的代表時犯了錯誤，並且為了不損害整個合併事業而不得不吞下綱領，那末你們確實沒有任何理由反對在**十五年後的今天**發表你們在最終決定前得到的警告。這既不會使你們成為笨蛋，也不會使你們成為騙子，除非你們奢望你們的正式言行絕對不犯錯誤。

誠然，你沒有讀過這一警告。但是報刊也談到過這一點，因此，比起讀了這個警告仍然順從草案的那些人，你處境的境地特別有利。

我認為附信非常重要，因為其中闡述了唯一正確的政策。在試行期間採取共同行動，這是唯一能使你們避免拿原則做交易的辦法。但是李卜克內西無論如何不想放棄促成合併的榮譽，令人

①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譯者注

奇怪的是：他在这方面沒有做出更大的让步。他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取得并且一直保持着真正的合并狂。

拉薩尔分子来靠攏我們，是因为他們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們的整个党全都垮了，是因为他們的領導人是流氓或笨蛋，群众不想再跟这些人走，——这一点現在可以用非常和緩的形式讲出来。他們的“严密組織”已自然而然地走向全部瓦解。因此，李卜克內西以拉薩尔分子牺牲了自己的严密組織为理由来辯解他全盘接受拉薩尔派信条的行为，这是很可笑的，——他們已沒有什么可牺牲的了。

綱領中这些含糊不清和混乱的詞句从哪里来的，对此你感到惊奇。要知道它們全都是李卜克內西的体现；由于这些詞句，我們跟他已爭論多年，而且他对这些詞句非常欣賞。他在理論上始終是不清楚的，而我們的尖銳的措辞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厌恶。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老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响亮的似是而非的詞句。如果說当时那些头脑不清的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能更好地理解，談論“劳动的解放”而不談工人階級的解放，如果說甚至在国际的文件中有些地方不得不采用这些人的語言，那末，这就成了李卜克內西用这种表达方式强使德国党返回到这种陈旧观点去的充足理由。無論如何不能說：“违背良心”，因为他的确知道得不清楚，而且我沒有把握說，他現在已經不是这种情况了。不管怎样，他至今仍然无时无刻不在返回陈旧的模糊不清的表达方式——自然，这种表达方式用在修辞学上倒是很方便的。由于他确实认为他自以为懂得的基本民主要求至少像他不完全懂得的經济学原理那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誠地相信：他承认拉薩尔派信条，以换取一堆民主的条文，这是做了一件光輝的事。

至于談到向拉薩尔进攻，在我看来，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这

一点我已向你们说过。由于接受了本质上是拉萨尔派的所有经济学词句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根据纲领来看是如此。拉萨尔派所能够保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牺牲，的确一点也没有牺牲。为了使他们获得全胜，你们采用了奥多尔夫先生赞扬拉萨尔的歌功颂德的押韵词句⁴⁹做你们的党歌。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的十五年内，当然没有任何可能在党内反对对拉萨尔的迷信。必须结束这种情况，并且我已经着手做起。我不再容许靠牺牲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假荣誉。和拉萨尔有面交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迷信纯粹是人工造成的，是由于我们违背良心予以默许而造成的，因此它甚至不能以个人的依附来辩解。那件东西在“新时代”上发表，这就已充分考虑到经验不足的新党员。但是，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在这类问题上的历史真理应当在党内的虚礼和可能的障碍面前退却。在这里，每一次都会伤害规规矩矩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以后会发怨言，这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说马克思妒嫉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11)“芝加哥先驱报”⁵⁰（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典型拉萨尔派写的，他们的数目比在整个德国还要多）同声附和，那末，这还比不上挨跳蚤咬使我不安。我们碰到的岂止这样一些事情，而我们总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例子已经有了，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拉萨尔，这在目前已经够了。

再者：你们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新时代”可能在党的意义上收归国有并被置于检查制度之下。从这时起，我就认为，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是奇怪的。如果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这对我个人来说大致上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决定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强

迫我沉默。但是，我想請你們考慮一下：少敏感点，在行动中少来点普魯士作风，对你們岂不更好？你們——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它沒有运动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就必須忍受任何不愉快的事，最好是老老实实地忍受，毫不在乎。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間发生不和，即使是很小的不和，更不用說分裂，都会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对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應該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們也應該而且能够以此为滿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辯論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們根本不知道，这种采取强制手段的傾向在这里、在国外使人感到多么奇怪，在这里有一种习惯，即要求党的最老的领导人（例如托利党政府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自己党内认真地报告工作。其次，你們不應該忘記：在一个大党内紀律無論如何不可能像在一个小宗派里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合在一起（的确，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是他的伟大綱領所造成的！）并使他們如此紧密团結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已經不再存在了。

哎！旧摊子該收了，現在談别的吧……

請代我向你的妻子，保尔^①，費舍，李卜克内西以及所有其他人致以衷心的問候。

弗·恩·

① 指保尔·辛格尔。——譯者注

附 录

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綱領

(1869年在爱森納赫通过)

- I. 社会民主工人党爭取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
- II. 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每一成員必須竭力实现如下各項原則：
 1. 現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因而必須最坚决地反对。
 2. 为劳动階級的解放而斗争不是为階級特权和优先权而斗争，而是为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消灭一切階級統治而斗争。
 3. 工人对資本家的經濟依附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人党在通过合作劳动消灭現今的生产方式(工資制度)的条件下，爭取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
 4. 政治自由是劳动階級經濟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社会問題同政治問題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决取决于后者，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
 5. 鉴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只有当工人階級共同地和統一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承认自己是統一的組織，但是它也使每一单个的成員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为整体的利益服务。
 6. 鉴于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涉及一切具有現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人党认为自己是一——在結社法允許的限度內——国际工人协会

的一个分支,并拥护它的一切努力。

III. 社会民主工人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

1. 凡年满 20 岁的男子在国会、各该邦的议会、省和区的代表机构以及其他一切代表机关的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当选的代表应给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薪俸。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即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

3. 废除等级、财产、出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

4. 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5. 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6. 实行国民小学的义务教育,以及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7. 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建立陪审法庭和专业法庭,实行正式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实行免费诉讼。

8. 废除一切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法律;实行正常劳动日制度;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

9. 取消一切间接税,实行单一的直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

10. 要求对合作社制度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綱領

(1875 年在哥达通过)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用于公益目的的条件下对总劳动实行集体调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粉碎铁的工资规律，废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工人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

起来,以便从它們里面产生出調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組織。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把下列各項作为国家的基础:

1. 凡年滿 20 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須定在星期日或节日。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的問題。

3. 实行普遍軍事訓練。以人民軍隊代替常备軍。

4. 废除一切特別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結社和集会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見、自由探討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

5. 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費訴訟。

6. 通过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在一切学校实施免費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現代社会內部提出下列要求:

1. 本着上述要求的精神尽可能扩大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

2. 向国家和地方繳納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現行的、特别是加重人民負擔的間接稅。

3. 保证无限的集会結社的权利。

4. 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合的正常劳动日。禁止星期日劳动。

5. 禁止童工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6. 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通过工人选出的人員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施有效的雇主責任法。

7. 調整監獄劳动。

8. 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注 释

- 1 卡·馬克思的著作“哥达綱領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論的根本問題的发展的重大貢獻，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典范，于1875年4—5月初写成，并于1875年5月5日寄給了爱森納赫派的領導(給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綱領草案的批評意見，这些意見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綱領批判”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領導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序言。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綱領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給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綱領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緩和某些最尖銳的地方。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第1頁。

- 2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1875年5月22—27日)，德国当时存在的两个工人組織——由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納赫建立的并由他們領導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所謂爱森納赫派)，和由哈森克累韦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領導的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协会——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3頁。
-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綱領主要起草人威廉·李卜克內西的提議，决定起草一个新綱領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討論。这个新綱領于1891年10月被通过(“爱尔福特綱領”)。——第3頁。
- 4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于1872年9月在同巴枯宁作斗争的标志下举

行的。代表大会的多数拥护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立场。巴枯宁被从国际开除出去。——第4頁。

5 指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1873年苏黎世版。——第5頁。

6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5頁。

7 指由馬克思亲自校订的“資本論”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6頁。

8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社，它附属于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第6頁。

9 指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頁），它是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于1875年在莱比錫出版的。——第6頁。

1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頁。——第16頁。

11 指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第16頁。

12 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編哈賽尔曼諷刺地称为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薩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枯宁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薩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

人們所进行的仇視总委员会的活动。——第 16 頁。

- 13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積極參加)于 1867 年在瑞士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組織; 1867—1868 年米·巴枯寧參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動的初期, 同盟企圖利用工人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聲稱通過建立“歐洲聯邦”可以消除戰爭, 以此在群眾中散布荒謬的幻想, 誘使無產階級放棄階級鬥爭。——第 17 頁。
- 14 巴黎公社失敗以後, 在 1871—1872 年, 俾斯麥企圖同奧地利和俄國簽訂一個正式協定, 目的是要共同迫害革命運動, 特別是第一國際。1873 年 10 月, 根據俾斯麥的倡議, 締結了所謂三國同盟, 即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三國政府之間就一旦發生“歐洲動蕩”採取共同行動的協定。——第 17 頁。
- 15 馬克思指的是 1875 年 3 月 20 日“北德總匯報”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草案發表的一篇社論; 文章同時指出, “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在某些方面變得比較謹慎了; 它在背棄國際”。

“北德總匯報”(«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動的日報, 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麥政府的機關報; 1861 年至 1918 年在柏林出版。——第 18 頁。

- 16 拉薩爾對他的“鐵的工資規律”作了如下的表述: “這個在現今的關係之下, 在勞動的供求的支配之下, 決定着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這樣的: 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後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這是這樣的一個中心點: 實際日工資總是在它周圍擺動, 既不能長久地高於它, 也不能長久地低於它。實際的日工資不能長期地高於這個平均數; 因為, 否則就會由於工人狀況的改善而發生工人人口從而人手供應的增加, 結果又會把工資壓低到原來的或者低於原來的水平。

工資也不可能長期地大大低於這個必要的生活水平。因為, 那時就會發生人口外流、獨身生活、節制生育, 以至最後由於貧困而造成工人人數減少等現象, 這樣, 就會使工人人手的供應短缺, 從而使工資重新回到它原來的較高的水平。因此, 實際的平均工資處於運動之中, 始終圍繞着它這個重心上下擺動, 時而高些, 時而低些。”(見“工人課本, 拉薩爾

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拉薩尔最初論述这个“規律”是在“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給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頁。——第18頁。

- 17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問題对現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斯堡版第144—161、180頁 (《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上所发表的言論。——第19頁。
- 18 “工場”(《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編輯部由工人代表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21頁。
- 19 見本书第32頁脚注。——第23頁。
- 20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給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魯士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糾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25頁。
- 21 这是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給奥·倍倍尔的信,就內容來說,它同卡·馬克思写的“哥达綱領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見。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綱領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謬論点和对拉薩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綱領的名称聞名。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們认为,必須在原則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不向已經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薩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納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評了哥达綱領草案,并警告爱森納赫派不要向拉薩尔派让步。

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2卷中(《Aus meinem Leben》，Teil 2, Stuttgart, 1911)。——第31頁。

22 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納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綱領。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納赫党。爱森納赫綱領总的米說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見本书第64—65頁。——第31頁。

23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納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該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編輯常被逮捕，該报編輯部成員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領導仍然由威·李卜克內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該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从該报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經常帮助編輯部，不断糾正报纸的路綫。——第32頁。

24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簡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32頁。

25 指的是哥达綱領草案的下列各項：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 凡年滿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 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決議案的直接的立法；3. 实行普遍軍事訓練，以人民軍隊代替常备軍，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問題；4. 废除一切特別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結社和集会的法律；5. 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費訴訟。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費教育。2. 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32頁。

26 即和平和自由同盟。見注13。——第33頁。

27 見注16。——第33頁。

- 2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76—784頁[參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17—854頁]。——第34頁。
- 29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冊子“拉薩爾的建議”1873年不倫瑞克版(《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1873)。——第34頁。
- 30 指“哲學的貧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頁)。——第35頁。
- 31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寧在他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導言中所說的話，該書第一卷於1873年在瑞士出版。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寧這本書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寧提出的責難是毫無根據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55—708頁)。
- “民主週報”(《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國工人的報紙；該報用這個名稱從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萊比錫出版，由威·李卜克內西主編。從1868年12月起，該報成為奧·倍倍爾領導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的機關報。最初該報受到人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定的影響，但是不久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該報開始同拉薩爾派進行鬥爭，宣傳國際的思想，刊登國際的重要文件，在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的創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宣布該報為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的中央機關報，並改名為“人民國家報”(見注23)。——第36頁。
- 32 在哥達代表大會上，由兩個合併的組織的代表組成了黨的領導機構。委員會由拉薩爾派的哈森克累韋爾、哈特曼、德羅西和愛森納赫派的蓋布、奧艾爾組成。——第39頁。
- 33 指委員會建議從黨的文獻目錄中刪除下列針對拉薩爾寫的幾本著作：伯恩哈特·貝克爾的“斐迪南·拉薩爾悲劇性死亡的真相”，1868年什萊茨版；“拉薩爾在工人中進行鼓動的历史”，1874年不倫瑞克版；威廉·白拉克的“拉薩爾的建議”，1873年不倫瑞克版。——第40頁。
- 34 下屆帝國國會選舉於1877年1月10日舉行。——第41頁。
- 35 恩格斯所說的“萊比錫人”，指的是李卜克內西、倍倍爾以及“人民國家報”編輯部的其他成員。——第41頁。

- 36 “新时代”(«Die Neue Zeit»)——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917年以前，考茨基担任编辑。1885—1895年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给编辑部以指示，对于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也给以激烈的批评。——第45页。
- 37 恩格斯指的是他不久以后发表的著作“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891年汉堡版。——第46页。
- 38 指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90年10月1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参见注3)。——第47页。
- 39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于1891年1月31日和1891年2月1日和3日先后在“新时代”杂志第18期和“前进报”上发表。
“前进报”(«Vorwärts»)——1876—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1891—1933年在柏林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1878年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累韦尔领导；1891—1900年由李卜克内西单独领导。——第48页。
- 40 “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从1887年起在汉堡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日报。——第50页。
- 41 恩格斯指的是拉萨尔在同名著作中阐述的“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莱比锡版。——第50页。
- 42 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党团。——第51页。
- 43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克多·阿德勒于1889年在维也纳创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第53页。
- 44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从1890年起在德累斯顿出版；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后来改为日报。
“苏黎世邮报”(«Züricher Post»)——1890年12月—1891年4月在苏黎世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第54页。
- 45 指的是1845—1854年拉萨尔以律师身份办理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第55页。
- 46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1891年2月13日在一篇编辑部专论中表明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正式态度。该文尖锐地指责了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评价，用“绝对不”来同马克思这样的权

威的建議相對抗，並且贊揚黨不顧馬克思的批評而通過綱領草案的行動。——第 56 頁。

- 47 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 1891 年第 4 版的準備工作。——第 57 頁。
- 48 “紐約人民報”(«New-Yorker Volkszeitung»)——從 1878 年起在紐約出版；是由左爾格創辦和領導的。——第 58 頁。
- 49 這裡指的是 1876 年 11 月 4 日奧多爾夫為紀念斐迪南·拉薩爾的忌辰而寫的序詩。——第 62 頁。
- 50 “先驅報”(«Der Vorbote»)——從 1881 年起在芝加哥出版；無政府主義的德文報紙。——第 62 頁。